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論趙紫陽的非洲之行

doi:10.30390/ISC.198302\_22(5).0003

問題與研究, 22(5), 1983

Wenti Yu Yanjiu, 22(5), 1983

作者/Author : 葉伯棠

頁數/Page : 15-29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 1983/0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2\\_22\(5\).0003](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2_22(5).0003)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页，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論趙紫陽的非洲之行

葉伯棠

去（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共「總理」趙紫陽開始訪問非洲十一個國家，這是自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周恩來訪問非洲以來，中共最高領導階層首次訪問非洲。趙紫陽此次訪問非洲的目的何在？以及此次訪問的影響如何？值得我們重視。

## 壹

近年來中共領導人在接見第三世界的訪客時，一再強調中共與第三世界的友好關係，如去（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第三世界四十四個國家在印度新德里召開「南南會議」，當時外交部副部長浦壽昌在大會上發表演說指出：中共是第三世界社會主義國家，願為第三世界團結而努力<sup>①</sup>。同年四月，鄧小平在接見巴西外長格雷羅（Saraiva Guerreiro）和非洲幾內亞比紹（Guinea-Bissau）元首維埃拉（Joao Bernardo Vieira）時，表示要加強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合作與交流。鄧小平指出：「我們要十分重視發展同第三世界的關係，把它提到當前議事日程上來」<sup>②</sup>。自此以後，中共一再提出類似的主張，強調中共「永遠屬於第三世界」，中共將「站在第三世界一邊」。去年八月二十一日，鄧小平在接見聯合國秘書長佩雷斯（Javier Perez de Cuellar）時甚至公開指責超級大國相互爭奪霸權，他強調「第三世界國家作為反對霸權主義的主力，在國際政治中的份量越來越大，這是任何人也不能忽視的。超級大國主宰世界人民命運的時代已經過去」<sup>③</sup>。去年九月鄧小平在中共第十二屆黨代表大會開幕詞中，把反對霸權列為中共八十年代三大任務之一。

註① *China Daily*, February 22, 1982.

註② 〔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註③ 〔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爲了表示與第三世界合作，執行反霸權的政策，中共除了經常邀請第三世界尤其是非洲各國的政要訪問中國大陸外，也不斷派高級人員訪問非洲各地。這說明中共正積極加強與非洲國家的關係。至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共首先透露趙紫陽將訪問埃及、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幾內亞、薩伊、贊比亞和坦桑尼亞<sup>④</sup>。以後漸漸增加訪問國家的數目，至十二月十七日中共正式宣佈趙紫陽將訪問非洲十個國家，除上述七個國家外，尚增加，剛果、津巴布韋和肯亞三國，在訪問途中，趙紫陽又臨時把加彭（Gabon）列入訪問日程當中。

去年十二月二十日，趙紫陽帶領「國務委員」谷牧、「外交部長」吳學謙和「對外經濟貿易部副部長」呂學儉等六十六名隨員離開北平，啓程訪問非洲，這是自從一九六三年周恩來非洲之行以後十九年來中共第二次最高級人員的訪非活動，故「人民日報」誇說這是中共「與非洲關係史上的重大事件」。「人民日報」在社論中表示：「當前非洲的政治形勢，同六十年代初期相比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除了納米比亞和南非人民還在進行反對殖民統治和種族主義的鬥爭外，非洲各國基本上完成了民族獨立的偉大歷史任務。目前，廣大非洲國家都在致力於發展民族經濟，以爭取經濟獨立來鞏固得來不易的政治獨立。這是當前非洲形勢發展的主流，然而由於南非種族主義者還在負隅頑抗和破壞搗亂，超級大國爲了各自的霸權利益，在非洲爭奪勢力範圍，把非洲搞得很快發展的重要原因」<sup>⑤</sup>。

基於上述的看法，「人民日報」進一步指出：中共屬於「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屬於第三世界，反對霸權主義」。社論繼續指出，中共與第三世界國家具有相似的苦難與經驗，面臨共同的問題和任務。中共「把堅決支持非洲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南非種族主義和以色列擴張主義的鬥爭，看作是自己神聖的國際義務。」「堅決支持非洲國家和人民爲發展民族經濟，爭取經濟獨立，要求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所作的努力」<sup>⑥</sup>。由此可以看出，趙紫陽這次訪問非洲主要目的約有三項：一、反對霸權主義；二、反對南非種族主義、以色列擴張主義；三、企圖拉攏非洲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

## 貳

正由於上述的目標，中共才決定把埃及列爲趙紫陽這次訪問非洲國家的第一站。因爲埃及不論在阿拉伯世界或非洲國家集團

註<sup>(4)</sup>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24, 1982.

註<sup>(5)</sup> 〔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註<sup>(6)</sup>

同註<sup>(5)</sup>。

，甚至不結盟國家中，一向都有重大的影響力，尤其是一九七七年三月第一屆「非阿高峯會議」在埃及首都開羅召開，會中決定成立「非阿聯合協商機構」(A Joint Afro-Arab Consultation Machinery)，下設「協調委員會」(the Coordinate Committee)和「常任委員會」(the Standing Commission)以執行阿拉伯世界與非洲國家之間的合作事宜<sup>⑦</sup>。因此中共不論在討論阿拉伯問題或非洲問題時，都不能不重視埃及。事實上，過去中共一向把改善與埃及的關係，作為發展與阿拉伯世界關係的起點，爲了爭取與埃及的友誼，中共曾經送給埃及兩艘潛艇和九十架戰鬥機<sup>⑧</sup>。

十二月二十一日，趙紫陽抵達埃及展開爲期三天的訪問，並會與埃及總統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舉行兩次會談。趙紫陽在穆巴拉克總統爲他舉行的宴會上，除了重申一九六三年周恩來提出的中共「處理同非洲國家和阿拉伯國家相互關係的五項原則」外，仍然表示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同世界各國的關係。他並指出：「非洲地區……成爲第三世界的一支強大力量。這是歷史的潮流，是任何人也阻擾不了的。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任意擺布世界命運的局面已經一去不復返了」<sup>⑨</sup>。

對於中東問題，趙紫陽首先指責以色列頑固堅持侵略擴張政策，嚴重威脅着中東。故他表示：中共「一貫地站在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一邊，堅決支持他們反對以色列侵略擴張的正義鬭爭。以色列必須撤出一九六七年佔領的阿拉伯土地，其中包括阿拉伯耶路撒冷。必須恢復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權利，其中包括返回家園、自決和建立國家的權利。在此基礎上，中東各國享有獨立和生存的權利」<sup>⑩</sup>。最後趙紫陽說：中共與「非洲國家有相似的若難經驗，今天又面臨共同的艱巨任務」<sup>⑪</sup>。

趙紫陽這種主張並無新穎之處，可能參照沙烏地阿拉伯所提解決中東問題的方案在基本上幾乎相似。去年九月第十三屆阿拉伯高峯會議在摩洛哥菲茲(Fez)召開，沙烏地阿拉伯國王提出解決中東問題的八點建議，其中也包括准許巴勒斯坦建國並以耶路撒冷爲首都<sup>⑫</sup>。中共所以採取阿拉伯高峯會議的主張，主要的目的就是對阿拉伯國家進行統戰。然而美國在現階段並不贊同巴勒斯坦建國，而主張其與約旦組成聯邦<sup>⑬</sup>。由此可見，中共在中東問題上正設法拉攏阿拉伯國家對抗美國，也就是想利用阿拉伯

註⑦ Chedly Ayari, "Afro-Arab Relations: What Future for Cooperation?" *Africa Report*, May-June, 1982, p. 42.

註⑧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ember 24, 1982.

註⑨ 〔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註⑩ 同註⑨。

註⑪ 同註⑩。

註⑫ *The Muslim World*, September 18, 1982.

註⑬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Vol. 19, No. 9 (October 15, 1982), p. 6602.

國家達到反美的目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共與蘇俄所提出的意見甚為相似，蘇俄也批評雷根政府解決中東的方案，支持沙烏地阿拉伯的方案<sup>(14)</sup>。這一事實顯示，對於解決巴勒斯坦問題中共與蘇俄的立場是一致的。

但是趙紫陽是否能達到反美的目的，不無懷疑。就目前埃及與美國的友好關係，以及美國對埃及的經濟和軍事援助而言，埃及不可能接受趙紫陽的主張<sup>(15)</sup>。在另一方面，近年來埃及與蘇俄的關係也已漸趨好轉，蘇俄開始恢復對埃及的技術援助<sup>(16)</sup>。故趙紫陽反霸的主張無法使穆巴拉克接受。也由於這種原因，趙紫陽在開羅對埃及的「中東社」記者談話時承認：「由於各自國家的經濟經驗不同，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在某些問題上存在不完全一致的看法是很自然的，這絲毫不會影響中埃之間的關係的發展」<sup>(17)</sup>。從這段談話可知，趙紫陽這次埃及之行並未收到預定的效果。

此外，雙方尚討論了經濟合作和軍事合作問題。在經濟合作方面，埃及要求使用一九六四年周恩來同意貸款一億二千八百萬美元尚未使用的餘款。對於這一貸款問題，埃及將派專人前往北平商討細節。在軍事方面，中共決定以九十架相等於米格二十一型的F-17型戰鬥機給予埃及<sup>(18)</sup>。

經過三天的埃及訪問之後，趙紫陽由開羅飛抵阿爾及利亞訪問。中共過去與阿國關係一直良好，一九六〇年中共積極阿國獨立戰爭，讚揚阿爾及利亞是非洲人民反抗殖民主義光輝的榜樣。去年四月阿國總統沙德利（Chadli Ben Djedid）曾經訪問北平。阿爾及利亞不論在北非或阿拉伯世界中都具有影響力，這是趙紫陽把阿國列入訪問的主要原因。當趙紫陽抵達阿國機場時，他發表談話表示，中共「一貫重視發展同阿爾及利亞的友好合作」<sup>(19)</sup>。這證明中共仍繼續設法爭取與阿國的友誼。

這次趙紫陽訪問阿國是着重在經濟方面。他首先指出，雙方的關係是「根據南南合作的精神得到進一步的發展」<sup>(20)</sup>。他除了說明當前中共的經濟政策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下搞活經濟的政策」外，並首先透露中共與第三世界國家經濟合作的原則，即「平等互利，講求實效，形式多樣，共同發展經濟技術合作」<sup>(21)</sup>。

在阿爾及利亞訪問期間，趙紫陽曾經會見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執行委員會主席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雙方在會談中

<sup>(14)</sup> *ibid.*

<sup>(15)</sup>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10, 1983.

<sup>(16)</sup> *ibid.*

<sup>(17)</sup> [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sup>(18)</sup>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ember 24, 1982.

<sup>(19)</sup> [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sup>(20)</sup> [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sup>(21)</sup> 同註<sup>(20)</sup>。

，趙紫陽重申：中共「將一如既往地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鬪爭，亦認為必須恢復巴勒斯坦的民族權利，包括自決和建國的權利」<sup>②2</sup>。同時趙紫陽又強調「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是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應當參加關於中東問題的解決」<sup>②3</sup>；「巴勒斯坦問題是中東問題的核心，巴勒斯坦各民族權利得不到恢復，中東問題就不能解決」<sup>②4</sup>。最後他重申中共將始終如一地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場。

趙紫陽在阿爾及利亞接見阿拉法特時表示中共支持的立場，除了爭取巴解的友誼外，也想設法贏得阿拉伯國家的好感，這種立場與蘇俄支持巴解在中東的立場完全相同。蘇俄對巴解組織軍事援助是盡人皆知的事實<sup>②5</sup>。因此，這也可以證明，對於中東問題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中共與蘇俄的立場是一致的。

## 地

結束在阿爾及利亞的訪問之後，十二月二十七日趙紫陽逕行前往摩洛哥首都拉巴特（Rabat）訪問。摩洛哥是非洲國家第一個承認中共之國家。去年九月阿拉伯國家高峯會議即在摩洛哥舉行，這說明摩洛哥在阿拉伯國家中的影響力。顯然，中共有意透過摩洛哥爭取阿拉伯國家的友誼。故趙紫陽在此次訪問摩洛哥時，讚揚摩洛哥對於加強阿拉伯國家的團結的貢獻，以及菲茲阿拉伯高峯會議的積極成果<sup>②6</sup>。其次，去年二月摩洛哥首相布阿比德（Maati Bouabid）訪問中國大陸，當時趙紫陽表示第三世界應致力於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加強開發中的國家合作。趙紫陽特別強調中共與摩洛哥人民合作，反對霸權主義<sup>②7</sup>。摩洛哥對於中東問題的立場，受到中共的支持，這是趙紫陽把摩洛哥列入訪問行程的主要原因。在雙方舉行會談時，摩洛哥首相布阿比德表示摩洛哥的立場說：「摩洛哥堅持不結盟政策，堅決支持巴勒斯坦收復被以色列佔領的土地的耶路撒冷，以及對阿富汗和柬埔寨的立場，譴責殖民主義，主張南北對抗和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sup>②8</sup>。這可以說與中共的立場頗為相似。

就目前摩洛哥的情勢而論，目前摩洛哥為西薩哈拉領土而與普力沙雷奧陣線（Plisario Front）的游擊隊從事激烈戰鬥。這一組織要求在西薩哈拉地區建立薩哈拉阿拉伯民主共和國（the Saharan Arab Democratic Republic），摩洛哥堅決的反對這種主張。一九八一年六月非洲團結組織在肯亞首都內羅畢（Nairobi）召開高峯會議時，會中建議由西薩哈拉人民舉行公民投票

註<sup>②2</sup> 同註<sup>②1</sup>。  
註<sup>②3</sup> 同註<sup>②2</sup>。

註<sup>②4</sup> Yonah Alexander, "Some Soviet-PLO Linkage," *Middle East Review*, Spring-Summer, 1982, pp. 64-68.

註<sup>②5</sup> *China Daily*, December 10, 1982.

註<sup>②6</sup> *China Daily*, February 25, 1982.

註<sup>②7</sup> 〔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票，實行民族自決，也受到摩洛哥堅決的反對<sup>㉙</sup>。但是摩洛哥獲得美國的支持以對抗由阿爾及利亞及利比亞支持的巴沙雷奧陣線，導致非洲組織內部的分裂<sup>㉚</sup>。對於這種紛爭，趙紫陽既然訪問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理應從中調解，事實卻不然，他卻迴避這個問題，認為這個問題應由非洲團結組織「通過和平協商解決它們之間的爭端和分歧」<sup>㉛</sup>。從中共的立場可知，趙紫陽訪問非洲的目的，祇是執行中共反美的既定的政策，並非有助於非洲問題的解決。

結束摩洛哥訪問之後，趙紫陽飛往幾內亞首都科納克里(Conakry)訪問。幾內亞在二十五年前從法國手中獲得獨立，獨立以後，杜爾(Sekou Toure)當選為幾內亞總統至今。去年五月十四日，杜爾連任第四屆(每屆七年)總統，他在就職宣言時表示，為了建立非洲經濟社會的真正團結，應解放全非洲以達到非洲人完全的重建<sup>㉜</sup>。這種主張與中共反對「南非種族主義」的政策不謀而合，這可能是促成趙紫陽訪問幾內亞的主要原因。故趙紫陽在抵達幾內亞之時，即讚揚杜爾總統「為推動非洲國家團結和第三世界國家團結所作的努力和貢獻」<sup>㉝</sup>。

趙紫陽在科納克里體育場向羣眾演說時，除了重申周恩來所提的中共處理非洲事務五原則仍然是當前中共的「指導思想」外，又提出了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主張。他強調第三世界必須團結互助，進行「南南合作」。他認為「南南合作」具有偉大的戰略意義，有着廣闊的前景。接着他闡述中共與非洲經濟合作的指導原則，他說：「根據團結友好、平等互利的原則同非洲國家進一步在經濟技術方面進行合作。這種合作應是嚴格尊重主權和不干涉內政，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的。這種合作應從雙方的實際需要和可能條件出發，發揮各自的長處和潛力，因地制宜，採取多種多樣的方式，以取得良好的經濟效益。這種合作不是為了任何別的目的，而是為了取長補短，互相幫助，以利於增強雙方自力更生的能力，促進各自民族經濟的發展。我願意利用這次訪問非洲的機會，同非洲各國領導人共同探討開闢這種經濟技術合作的可能性和可能採取的方式和途徑，俾能在『南南合作』的道路上探索前進」<sup>㉞</sup>。

趙紫陽在訪問非洲期間，一再主張在「南南合作」的基礎上與非洲國家實施合作。至於這種合作所收到的效果究竟有多大，仍然值得懷疑；即使如趙紫陽所提的辦法，「從雙方實際需要和可能條件出發，發揮各自長處和潛力，因地制宜」，也很難收到

註<sup>㉙</sup> Interviewed by Tony Hodges: Mohamed Abdelaziz. *Africa Report*, July-August, 1982, pp. 15-17.

註<sup>㉚</sup> Tony Hodges, "The Endless War", *Africa Report*, July-August 1982, pp. 4-16.

註<sup>㉛</sup> [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一十九日。

註<sup>㉜</sup>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Vol. 19, No. 5 (June 15, 1982), p. 6458.

註<sup>㉝</sup> [人民日報]，一九八三年一月一日。

註<sup>㉞</sup> 同註<sup>㉝</sup>。

經濟合作的效果。因為經濟發展需要資金、科技和企業管理的人才，這些條件絕大多數的非洲國家皆缺乏。目前非洲國家最大的問題就是貧窮與落後，依照一般統計，在非洲五十四個國家之中，有四十個列入貧窮的國家。再就一九七五年的統計，非洲國家人民就讀中學的祇佔百分之十一，就讀大學的祇佔百分之一・四，是世界上各地區人口入學人數最少的地區<sup>(35)</sup>。

進一步而言，目前非洲國家尤其是南部非洲國家糧食不足，連生存都成了問題，決不可能像黃華所說的「掌握自己的命運，推動世界歷史的過程」<sup>(36)</sup>。如要發展糧食，必須具備現代農業技術、灌溉和運輸<sup>(37)</sup>。非洲大多數國家都缺乏這種條件，因此非洲國家也很難做到像趙紫陽所說的「取長補短，互相幫助」。故中共所提倡的「南南合作」，正面臨到「巧婦難爲無米之炊」的苦境。要想真正實行「南南合作」，就必須有一個「南南」國家擁有資金，提供科技，具有開發農業的人才並願意提供才行。但是強調與第三世界互相支援的中共，連自己的經濟發展也要依賴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和科技，如何能實現「南南合作」。依照外電報導，中共爲了生產現代化，需要一百億美元<sup>(38)</sup>。而中共目前缺乏這筆巨大的資金，祇有尋求西方國家的投資或貸款<sup>(39)</sup>。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共顯然沒有力量協助非洲國家發展經濟，因此絕大部分非洲國家都希望美國的援助。研究第三世界經濟的學者認爲「南南合作」必須建立於「南北合作」的基礎上。「南北合作」是「南南合作」成功的先決條件，因爲沒有工業化國家的資金和技術，甚至人才的協助，「南南合作」是沒有希望的<sup>(40)</sup>。

至於目前中共所提倡的「南南合作」，顯然是由中共提供少數貸款，購買中共的產品，以發展非洲國家的中小型企業。嚴格的說，這不是「南南合作」，而是加強「南南」之間的貿易；而就目前中國大陸與非洲之間的貿易言，中共卻是處於巨大的順差<sup>(41)</sup>。由此可知，中共很可能以加強「南南合作」的名義，發展中共與非洲國家的貿易，並從這種貿易的盈餘來彌補對西方國家的逆差。如果這種說法是正確的話，中共所提出的「南南合作」，祇不過是對非洲經濟剝削的另一種手段而已。

幾內亞訪問之後，趙紫陽接着前往加彭(Gabon)首都利伯維爾(Libreville)訪問。原來加彭並未列入趙紫陽訪問的行程

註<sup>(35)</sup> William R. Collier, "The Neglected Continent" *African Report*, March-April, 1979, p. 11.

註<sup>(36)</sup> 〔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十月四日。

註<sup>(37)</sup> S. K. Sinha, "Third World Must Learn to Be Self-Sufficien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31, 1982.

註<sup>(38)</sup> Takashi Oka "China Plans to Borrow Over \$ 10 Billion",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ember 2, 1982. "China Announce \$ 10 Billion Plan To Modernize Factories New Goal",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10, 1982.

註<sup>(39)</sup>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24, 1982.

註<sup>(40)</sup> Shridath S. Ramphal, "South-South Parameters and Precondition,"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4 No. 3 (July 1982), pp. 461-466.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ember 18, 1982.

不知何因，趙紫陽臨時決定要去訪問。加彭的總統奧馬爾·邦戈（El Hadji Omar Bengo），曾於一九七七年訪問中國大陸。趙紫陽在訪問加彭之時，除了重申「南南合作」和中共對第三世界經濟發展四項原則外，並邀請邦戈總統再度訪問中國大陸<sup>(12)</sup>。

## 肆

今（一九八三）年一月二日，趙紫陽不到剛果卻先到薩伊的金沙薩（Kinshasa）訪問。這說明中共近年來積極拉攏與薩伊的關係，尤其是自一九七五年安哥拉內戰結束以後，中共更竭力支持薩伊對抗安哥拉和剛果的親蘇勢力。薩伊現任總統是莫布杜（Mobutu Sese Seko），曾經於一九八〇年三月和去年七月兩度訪問中國大陸，趙紫陽這次往訪，除了繼續爭取莫布杜之外，也含有答訪的性質。

然而莫布杜自一九六五年以政變方式奪取政權以後，即實行專制獨裁，導致薩伊國內民窮財盡，依賴外國的援助而勉強維持其政權的存在。法國、比利時、摩洛哥和中共都透過投資和軍事援助的方式，支持莫布杜政權，而最大的支持者卻是美國。由於政策失措，人民貧窮，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莫布杜於去年訪問中國大陸及北韓以後，受到所謂「革命的急進化」（the radicalization of the revolution）的影響，企圖以實施商業國有化與農業生產集體化來解決糧食不足<sup>(13)</sup>。結果不但未收到預期的目標，反而造成更嚴重的經濟危機。一九七八年第二次對沙巴省入侵事件發生以後，美國立即採取行動支持莫布杜政權，使許多薩伊人認為美國是莫布杜政權的主要支持者<sup>(14)</sup>。

當趙紫陽抵達金沙薩以後，莫布杜特別在由中共斥資興建的「人民宮」廣場前舉行歡迎式<sup>(15)</sup>。莫布杜在歡迎會上說：「中共一貫支持第三世界的國家的合法立場和要求，這就使它成為不結盟國家的特殊的盟友」<sup>(16)</sup>。莫布杜並強調要不遺餘力地支持南部非洲被壓迫人民的解放。從上述這些話可知，莫布杜顯然有意為中共在第三世界和不結盟國家集團中拉關係。這也許是中共爭取莫布杜的主要原因，也是趙紫陽這次訪問非洲國家的動機之一。

趙紫陽在向薩伊人民演說時，指責霸權主義對開發國家的壓迫與剝削。他說：「當前非洲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都面臨着發

註<sup>(12)</sup> 〔人民日報〕，一九八三年一月三日。

註<sup>(13)</sup> Thomas Turner, Mobutu's Zaire: "Permanently on the Verge of Collapse?" *Africa Affairs* April 1981, p. 124.

註<sup>(14)</sup> John/Krau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Next Decades", *Africa Affairs*, 1981, p. 100.

註<sup>(15)</sup> 人民宮是參照北平人民大會堂設計的。

註<sup>(16)</sup> 〔人民日報〕，一九八三年一月四日。

展民族經濟，以經濟獨立鞏固政治獨立的任務，廣大發展中國家都希望有一個和平安全的國際環境，超級大國的爭奪弄得全世界不得安寧，一些發達國家的經濟危機，使發展中國家深受其害」<sup>(47)</sup>。故他主張建立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最後趙紫陽提出訪問非洲的三個目標：一、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合作；二、反對霸權主義；三、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sup>(48)</sup>。

對於如何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趙紫陽並未具體說明，但中共「外長」吳學謙在金沙薩作了間接的表示。吳學謙談到中共與非洲國家經濟發展的方式時，提出了新的形式和新的途徑。這就是除了過去中共以貸款援助的方式興建外，還應該考慮採取合營的辦法，建設某一個項目，通過有效的合作，為「南南合作」創造好的經驗<sup>(49)</sup>。他進一步指出：「根據中國的經驗，這種合作應該有助於提高發展中國家自力更生地發展民族經濟的能力。發展中國家應該首先依靠本國人民的勞動熱情，並且積極培養本國的人才，建立起獨立的民族經濟體系」<sup>(50)</sup>。

這種主張等於說非洲各國經濟應該在「自力更生」的原則之下謀求發展，這與非洲國家的願望完全相反，也使南部非洲國家希望中共給予經濟援助的願望完全落空。事實上，中共如沒有能力提供大量的經濟援助，就很難獲得南部非洲國家在政治上的支持。尤其是薩伊政府，可以說是全靠外債來支持。依照薩伊政府自己承認，一九八〇年代後期，薩伊政府第一優先就是償付西方銀行的借款。據美國國務院估計，薩伊外債總數共計六十四億。這筆數目等於薩伊礦產輸出的百分之二十七<sup>(51)</sup>。因此，這次趙紫陽訪問薩伊，曾就一千萬美元貸款的償還問題，與莫布杜達成協議，即把一九八三年七月到期的應付款額，作為中共與薩伊合作項目的「中」方資金<sup>(52)</sup>，這也等於中共變相地放棄了索回借款。

據報導，莫布杜在與趙紫陽舉行第二次正式會談時，強調除了支持納米比亞獨立外，反對把納米比亞獨立與安哥拉撤軍相提並論，也反對南非少數白人統治的政策。莫布杜也談到巴勒斯坦問題，他認為巴勒斯坦人有返回家園和建立自己國家的權利<sup>(53)</sup>。阿拉伯國家也有收復失地的權利。這種主張恰好與中共的主張，互相呼應。

在訪問薩伊之後，趙紫陽接着前往剛果首都布拉薩維爾（Brassville）訪問。中共過去與剛果的關係一向良好，在「文革」

註(47)

同註(46)。

註(48)

〔人民日報〕，一九八三年一月五日。

註(49)

Thomas Turner, op. cit.

註(50)

〔人民日報〕，一九八三年一月八日。

註(51)

〔人民日報〕，一九八三年一月五日。

時，中共與許多非洲國家斷絕外交關係，但始終與剛果保持正常的關係，自從一九七〇年代開始，剛果受到蘇俄的支持，與中共支持薩伊形成對峙的狀態<sup>⑤2</sup>。尤其是在一九七五年安哥拉獨立內戰時期，蘇俄無條件的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the People's Moveme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Angola），與中共支持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The Front for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of Angola）形成水火不相容的局面。自一九八〇年以後，南部非洲安哥拉、剛果和薩伊的關係改善，中共與剛果的關係亦隨之改善，中共並幫助剛果建立「布安札」發電廠，這次趙紫陽決定把剛果列為訪問的國家之一，其原因在此。其次，剛果一向是站在蘇俄一邊，例如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四日，聯合國大會投票要求蘇俄從阿富汗撤軍，剛果是投反對票。儘管對阿富汗問題，中共與剛果有歧見，但對於南部非洲的政策，雙方的立場很相近，故趙紫陽仍然設法拉攏剛果，在南部非洲形成反帝、反美的統一戰線，這是趙紫陽訪問剛果的另一原因。

一月四日，趙紫陽與剛果總統蘇·恩格索（Sasou Nguess）舉行會談。剛果方面重申支持巴勒斯坦的正義鬥爭，「強烈譴責南非種族主義政權無視所有國際準則，派遣突擊隊，在毗鄰的領土上製造恐怖」<sup>⑤3</sup>。這種立場與中共完全相同。趙紫陽除了重述中共經濟合作的方式外，對於外交政策表示不奉行等距離原則，不依附任何外國，執行獨立自由的外交政策，「同第三世界站在一起，加強與第三世界的團結與合作」<sup>⑤4</sup>。

## 伍

一月六日，趙紫陽由剛果抵達贊比亞首都盧薩卡（Lusaka）訪問。中共一向與贊比亞維持密切的關係，並視贊比亞為反對南非種族主義的前鋒。一九六〇年代末期，為了鼓勵贊比亞對抗羅德西亞，中共不惜耗資四億美元興建坦贊鐵路<sup>⑤5</sup>。

一九八〇年四月贊比亞總統卡翁達（Kennet David Kaunda）訪問北平，與中共簽訂「經濟、技術和文化合作協定」。卡翁達向對於南部非洲反對種族主義有重大的影響力，去年四月二十一日，卡翁達與南非總理包沙（P. W. Botha）在波札拉（Botswana）舉行高峯會議。這是歷史性的會談，引起了各方的矚目。「贊比亞時報」讚揚這次會談是卡翁達「長期和平之旅的第一步」<sup>⑤6</sup>

<sup>註52</sup> Alexandre M. Boukon, "An Africa Tringlen" *Africa Report*, Sept.-Oct. 1982, pp. 41-42.

<sup>註53</sup> [人民日報]，一九八〇年一月六日。

<sup>註54</sup> 回註<sup>53</sup>。

<sup>註55</sup> Denis Blodorth "China: Switch Backs in African's Turbulent World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ctober 12, 1975.

<sup>註56</sup>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Vol. 19, No. 4 (May 15, 1980), pp. 6413.

。這都足以說明卡翁達在南部非洲的影響力。去年十二月聯合國大會以絕大多數通過決議案，要求南非立即終止非法佔領納米比亞。趙紫陽此次非洲之行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推行反對南非種族主義，而贊比亞又是六個「前線國家」之一，自然列為訪問的對象。

在贊比亞訪問期間，趙紫陽讚揚卡翁達是「尊敬的老朋友」<sup>⑤9</sup>。一月六日，雙方舉行第一次會議，卡翁達提到納米比亞獨立問題時說：「不應有任何藉口，推遲納米比亞的獨立；反對把納米比亞獨立和古巴從安哥拉撤軍聯繫起來」<sup>⑥0</sup>。同時他也讚揚中共對南部非洲人民爭取民族獨立鬥爭的一貫支持。趙紫陽表示中共完全同意卡翁達的立場。

關於美國對南部非洲的政策，據美國務院負責非洲事務助理國務卿克勞科（Hester Crocker）在一九八一年九月於夏威夷美軍海外作戰和退伍軍人組織表示：雖然美國不同意南非種族隔離政策，但仍支持南非，其主要的目的在防止蘇俄集團勢力控制南部非洲，藉以保障美國在該地區的經濟利益，確保好望角戰略運輸路線（strategic Cape Sea Rout）<sup>⑥1</sup>。基於這一政策，美國對於納米比亞問題的解決，是先要求古巴軍隊從安哥拉撤退；其次，要求「安哥拉解放人民運動」（Popular Moveme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Angola）與由南非支持的安哥拉完全社會民族聯盟（National Union for the Total Independence of Angola）游擊運動談判，准許後者參與安哥拉政府。

美國所以有這種主張，是根據近年來蘇俄在非洲擴張勢力的結果。原來美國認為非洲的民族主義勢力必能阻止外國勢力的干預，但是一九七八年蘇俄在非洲之角（the Horn of Africa）支持衣索匹亞對抗索馬利亞的民族主義獲得成功；而在一九七五年古巴軍隊支持左派「安哥拉解放人民運動」戰勝了代表民族主義勢力的「安哥拉完全社會民族聯盟」<sup>⑥2</sup>。這對美國對非洲的政策打擊甚大。目前美國不顧聯合國的決議及不結盟集團的壓力，堅決要求古巴軍隊從安哥拉撤退，作為承認納米比亞獨立的先決條件<sup>⑥3</sup>。可是安哥拉認為南非軍隊不斷地對安哥拉突擊，對安哥拉的安全形成嚴重的威脅。同時安哥拉這種立場又受到南部非洲

註<sup>⑤9</sup> 〔人民日報〕，一九八三年一月七日。

註<sup>⑥0</sup> 同註<sup>⑤9</sup>。

註<sup>⑥1</sup> 同註<sup>⑤9</sup>。

註<sup>⑥2</sup> Tom Arms, "West Divided on Namibi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20, 1981.

註<sup>⑥3</sup> Andrian Guecke, "Southern African and the Super-powers", *International Affairs*, Summer 1981, p. 660.

註<sup>⑥4</sup> Bernard Guerizma, "U. S. Sends Mission to Angola, Reviewing Bid for Cuban Pull ou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ember 18, 1982.

國家的支持。雷根總統爲此，曾特別致函給六個「前線國家」(front-line states)（即坦桑尼亞、莫三鼻克、波札拉、津巴布韋、贊比亞和安哥拉），卻未收到效果<sup>⑯</sup>。

現在中共對安哥拉的政策不但與美國的政策公開發生衝突，同時也放棄了過去對安哥拉的立場。一九七六年四月中共曾嚴詞譴責蘇俄「把自己打扮成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天然盟友』」，「利用僱傭軍打頭陣，殘殺黑人，自己坐收漁利」，「是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推行新殖民主義政策的一個最新的特徵」<sup>⑰</sup>。當時中共「駐聯合國代表」黃華又堅決主張蘇俄軍事人員及古巴軍隊「必須立即全部從安哥拉撤出」<sup>⑱</sup>。故國際間認爲中共與蘇俄在非洲互爭勢力範圍<sup>⑲</sup>。但是時至今日，中共爲了對第三世界統戰策略的運用，也爲了爭取第三世界的好感，對於亞非地區多數國家支持的政策，無不隨聲附合，對於巴勒斯坦問題的立場是如此，對於納米比亞問題的立場也是如此。特別是納米比亞獨立問題受到非洲大多數國家的支持，如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五日非洲團結組織第三十四屆解放委員會在達雷斯薩拉(Dar es Salaam)重申採取解放戰爭的方式，直到納米比亞問題解決爲止<sup>⑳</sup>。接着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九日安哥拉政府召開非阿團結會議(Afro-Arab Solidarity Conference)，會中發表「盧安達宣言」，支持「非洲人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反對南非種族主義<sup>㉑</sup>。一九八二年三月七日南部非洲六個「前線國家」在莫三鼻克的馬布托(Maputo)集會，並且發表聯合聲明，決定採取聯合行動共同對付南非，並保證支持「非洲人國民大會民族主義運動，加強武裝鬥爭，以達成民族獨立」<sup>㉒</sup>。這些行動都與中共的政策相符合，也因爲這種原因，更爲了加強對南部非洲的統戰，一月六日趙紫陽在盧薩卡接見「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坦博(Oliver Tambo)和西南非洲人民組織(South West African People's Organization)執行委員兼聯合國納米比亞學院院長根哥布(Hage Geingob)，表示中共對這兩個組織的支持<sup>㉓</sup>。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組織都是受到莫斯科的大力支持，現在中共也支持它們，再度證實中共在南部非洲的政策與蘇俄是採取一致的立場<sup>㉔</sup>。

<sup>註⑯</sup> Jous Wisnitz, "US Effort to Get Cuban Out of Angola Fail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7, 1982.

<sup>註⑰</sup> <新華社>記者述評：「是支持解放運動，還是推行新殖民主義？」，《人民日報》，一九七六年三月廿十八日。

<sup>註⑱</sup> Michael T. Kaufman, "Moscow and Peking Take different Road To Influence", *The New York Times* (the Week Review), March 7, 1976.

<sup>註⑲</sup>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February 15, 1980, p. 5531.

<sup>註⑳</sup>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Vol. 18, No. 11 (December 15, 1981), p. 6274.

<sup>㉑</sup> *Ibid.*, Vol. 19, No. 3 (April 15, 1982), pp. 6373-74.  
*China Daily*, January 9, 1983.

<sup>㉒</sup>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7, 1983.

一月六日，趙紫陽與卡翁達舉行第二次會議，這次會議的重點是討論雙方經濟合作問題。據卡翁達表示，非洲政治獨立受到經濟惡化的威脅，故他希望中共能像五〇年代和六〇年代支持非洲國家政治那樣的支持非洲國家發展民族經濟<sup>④</sup>。但是趙紫陽卻顧左右而言他，祇介紹中共自己三十年來的經濟經驗，似乎有意以中共的經濟發展模式作為南部非洲國家的標準。這當然無法令卡翁達滿意。

這次趙紫陽的訪問也討論到償付中共借款問題。由於國際銅價和鈷金屬國際價格下跌甚大，而贊比亞就是靠這兩項金屬為主要輸出品，因此形成嚴重的經濟危機；而中共借給贊比亞約一億九千萬贊幣作為建造坦贊鐵路之用的貸款，從今年開始分期償還，勢必要延期<sup>⑤</sup>。

## 附

一月九日，趙紫陽由贊比亞飛抵津巴布韋首都哈拉雷（Harare）展開為期三天的訪問。在南部非洲各國當中，津巴布韋獨立的時間最短，但與中共的關係最為密切。現任總理墨加貝（Robert G. Mugabe）在反對羅德西亞白人統治時，幾乎完全依靠中共的援助，中共也因此贏得了墨加貝的感激<sup>⑥</sup>。在一九七七年六月，墨加貝以津巴布韋愛國陣線（Zimbabwe Patriotic Front）總書記的身份訪問北平，迨津巴布韋獨立以後，一九八〇年十月，墨加貝以總理的身份再度訪問北平。一九八〇年四月津巴布韋獨立，墨加貝當選為總理，中共特別派遣黃華前往道賀。津巴布韋不但是「前線國家」之一，而且最敵視南非，在津國獨立不到三個月之時，即一九八〇年六月十八日就宣告與南非斷絕外交關係<sup>⑦</sup>。由於中共反對南非種族主義，因此是趙紫陽特別把津巴布韋列入訪問的行程之內。津巴布韋獨立時間不到三年，內部問題甚多，尤其是經濟方面，由於長期戰火的蹂躪，使農業生產受到嚴重的破壞，加上天氣惡劣，久旱不雨，以致農業生產不足，亟需外國的援助，目前美國是最大的援助國<sup>⑧</sup>。

趙紫陽在抵達哈拉雷機場時發表書面講話指出：希望通過這次訪問，增進雙方的瞭解與友誼，加強團結和合作。墨加貝讚揚中共是「津巴布韋最忠實的朋友」。在津巴布韋訪問期間，趙紫陽也會禮貌性的拜會巴納納（Canaan Banana）總統。在談話

〔人民日報〕，一九八三年一月八日。

註<sup>④</sup>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10, 1983.

註<sup>⑤</sup>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ober 19, 1981.

註<sup>⑥</sup>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Vol 17, No. 1, p. 15, 5702.

註<sup>⑦</sup> Margaret A Novick, "Interviewed with Robert Mugabe," *Africa Report*, September-October, 1982, pp. 4-5.

中，巴納納感謝中共對津巴布韋的非洲民族聯盟（the Zimbabwean African National Union）提供援助，並認為這些援助對於津巴布韋革命的勝利，起了重要的作用<sup>②</sup>。這可以看出雙方過去關係的密切。趙紫陽並邀請巴納納訪問中國大陸。談到今後雙方技術和經濟的合作時，趙紫陽仍然主張在「南南合作」的範圍內進行。這種立場對亟需外援的津巴布韋來說，不免感到失望。一月十一日，趙紫陽與墨加貝簽訂「經濟技術合作協定」，中共將在五年內向津巴布韋貸款六千萬人民幣，無息並不帶任何條件，作為興建體育場或其他項目之用<sup>③</sup>。

一月十一日，趙紫陽在結束津巴布韋的訪問之後，接着飛往坦桑尼亞首都達雷斯薩拉姆（Dar es Salaam）作為期五天的訪問。中共與坦桑尼亞的關係一向良好，在「文革」期間，中國大陸經濟瀕臨崩潰邊緣，但中共仍然派遣一萬名工人並且耗資四億美元為坦桑尼亞建立一條長達一千一百六十一英里的鐵路，從此可以看出雙方關係的密切。近年來，坦桑尼亞高級官員經常訪問中國大陸，如一九七八年九月該國總理索科內（Edward Moringe Sokone）和一九八〇年四月該國副總統朱姆貝（Aboud Jumbe）相繼赴中國大陸訪問。其次，坦桑尼亞總統雷尼爾（Julius Nyerere）在第三世界中頗具影響力。一九六七年不結盟集團在坦國發表「阿羅榭宣言」（Arusha Declaration），一九八一年聯合國秘書長改選，中共堅決支持坦國外長薩爾姆（Sallim Salim）競選，同時非洲團結組織解放委員會也設在坦國。去（一九八一）年一月八日，被南非政府禁止的「非洲人國民大會」舉行成立七十週年紀念，就在坦國首都召開盛大慶祝會<sup>④</sup>。由於這些原因，趙紫陽把坦桑尼亞列入訪問的行程。

目前坦桑尼亞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尤其是坦國北部經過長期的乾旱，糧食生產不足，坦國政府遂採取緊急配糧措施。依照雷尼爾的估計，坦桑尼亞需要艱苦工作十二年之久，才能使經濟復甦<sup>⑤</sup>。然而目前中共在「南南合作」的範圍內，不可能解決坦國的經濟危機，但是雙方在政治上仍然保持非常親密的關係。

趙紫陽在坦國有幾項活動值得注意：（1）他在達雷斯薩拉姆進一步闡述中共與非洲國家經濟合作四項原則，即：（1）遵循團結友好、平等互利的原則，尊重對方的主權，不干涉對方的內政，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不要求任何特權。（2）從雙方的實際需要和可能條件出發，發揮各國的長處和潛力，力求投資少，工期短，收效快，俾能取得良好的經濟效益。（3）方式可以多種多樣，因地制宜，包括提供技術服務，訓練技術管理人員，進行科學技術交流，承建工程，合作生產，合資經營等；中共方面對所承擔的合作項目，負責守約、保質、重義中共派出的專家和技術人員，不要求特殊的待遇。（4）這項合作的目的，在於取長補短，互相幫助，

註<sup>②</sup> *China Daily*, January 11, 1983.

註<sup>③</sup> 〔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一日。

註<sup>④</sup> *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Vol. 19, No. 1, p. 6319.

註<sup>⑤</sup> John Dimschale, "Tow Roads to Socialism", *Africa Report*, September-October, 1982, pp. 14-15.

以利於增強雙方自力更生的能力和促進各自民族經濟的發展<sup>⑤</sup>。(2)、趙紫陽在坦國正式舉行記者招待會，回答記者的詢問，同時也正式宣示中共的立場：(1)中共反對以古巴從安哥拉撤軍作為南非從納米比亞撤軍和實現納米比亞獨立的先決條件。(2)中共支持「前線國家」對抗南非。(3)中共將設法使南部非洲的「各民族解放組織」共同團結起來。(4)中共承認安哥拉政府，支持反對種族主義的鬭爭。故趙紫陽在坦國期間，特別接見了「泛非洲人國民大會」(Pan-Africanist Congress)主席波克拉(John Ngati Pokela)。這是中共支持非洲黑人在南非從事獨立運動的具體證明。

一月十五日，趙紫陽離開坦桑尼亞轉到東非資本主義國家肯亞訪問。趙紫陽所以把肯亞列入訪問之列。是因為肯亞在非洲團結組織中具有影響力。肯亞現任總統莫伊(Daniel Arap Moi)是非洲團結組織的主席。一九八一年六月非洲團結組織在內羅畢(Nairobi)召開，會中激烈攻擊西方國家對納米比亞的政策，更反對南非。這種立場與中共目前的國際統戰目標完全符合，因此趙紫陽在訪問肯亞期間，主要是集中在非洲團結組織方面，支持肯亞「對維護不結盟運動本來的宗旨所作出的努力」<sup>⑥</sup>。也就是間接地鼓勵不結盟國家組織反美政策。

趙紫陽費時三十六天訪問非洲十一個國家，就他在此行中的言行來看，可以獲得兩點結論：第一、趙紫陽所提出的反對以色列擴張主義和南非種族主義，等於是反對美國支持以色列和南非的政策，而他在此次訪問中所表明的中共對中東問題和非洲問題的立場，大多與蘇俄在中東與非洲的政策不謀而合，故這次訪問對於中共與美國及蘇俄的關係影響如何，仍需要吾人進一步的觀察。第二、中共提出與非洲國家經濟合作四項原則作為「南南合作」的基礎，必然無法滿足非洲國家當前迫切解決經濟危機的需要。因為經濟合作涉及到資金、技術和人才等，而中共目前限於本身經濟落後以及缺乏建設資金，根本無法提供大量的經濟援助，因此中共是否能以經濟的手段獲得政治的利益，不無疑問。唯中共提出的「南南合作」會對第三世界產生什麼影響，仍值得吾人密切的注意與研究。

註<sup>⑤</sup> 〔人民日報〕，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五日。

註<sup>⑥</sup>

〔人民日報〕，一九八三年一月十六日。